

中外文学因缘

——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

北京出版社

中外文学因缘

——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内 容 提 要

《中外文学因缘》选编了戈宝权同志建国以来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中国翻译史、外国作家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以及对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方面所写的论文44篇。这是一部很好的比较文学论文集,它涉及的面非常广,资料性非常强,读者范围广,是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人员的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中外文学因缘

Zhongwai wenxue yinyuan

——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

戈宝权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顺义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75 印张 520000 字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7-200-01199-1/I·179

定价: 10.00 元



本书著者戈宝权近影（1991年1月）



1988年6月，苏联名作家马尔科夫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莫斯科苏联作家协会，授予戈宝权“各国人民友谊勋章”。上图为勋章，下图为授勋仪式。





戈宝权在法国汉学家鲁阿夫人家做客（1984年11月）



戈宝权和苏联达格斯坦女诗人阿利耶娃交谈（1989年4月）



戈宝权近年来获得的国际荣誉



戈宝权在巴黎访问罗曼·罗兰夫人（1984年11月）



在南京举行的首届戈宝权文学翻译奖授奖大会上，与得奖者合影。左起第四人是江苏省委副书记孙家正，右起第一人是省副省长吴锡军。（1990年11月）



戈宝权与夫人梁培兰在南京图书馆戈宝权藏书室内（1991年1月）

目 次

我怎样走上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的道路·····	(1)
------------------------	-------

第一部分：中俄文字之交

一、俄国作家和中国·····	(13)
----------------	--------

1. 俄国文学和中国·····	(13)
2. 普希金和中国·····	(35)
3. 屠格涅夫和中国·····	(62)
4. 冈察洛夫和中国·····	(82)
5. 托尔斯泰和中国·····	(100)
6. 契诃夫和中国·····	(125)
7. 高尔基和中国·····	(146)
8. 高尔基与中国革命斗争·····	(174)
9. 马雅可夫斯基和中国·····	(199)
10. 绥拉菲摩维支和中国·····	(219)

二、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	(223)
------------------	-------

1. “五四”运动前后俄国文学在中国·····	(223)
2. 俄国和苏联文学在中国·····	(241)
3. 乌克兰文学在中国·····	(248)
4. 谈普希金的《俄国情史》·····	(257)
5. 《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	

——谈普希金的名著的六种中文译本·····	(268)
6. 高尔基作品的早期中译及其他·····	(277)
三、中国的俄国和苏联文学的翻译家及研究家·····	(284)
1. 读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284)
附录：李大钊：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294)
2. 瞿秋白——翻译介绍外国革命文学的 普罗米修斯·····	(301)
3. 鲁迅——杰出的翻译家·····	(306)
4. 鲁迅和爱罗先珂·····	(313)
5. 鲁迅与苏联版画艺术·····	(330)
6. 忆耿济之先生 ——纪念耿济之逝世三十五周年·····	(357)

第二部分：中外文学因缘

一、翻译史话·····	(367)
1. 中国翻译的历史·····	(367)
2. 明代中译《伊索寓言》史话·····	(375)
(1) 谈利玛窦著作中翻译介绍的伊索寓言·····	(375)
(2) 谈虎迪我著作中翻译介绍的伊索寓言·····	(388)
(3) 谈金尼阁口授、张赓笔传的伊索寓言 《况义》·····	(401)
(4) 再谈金尼阁口授、张赓笔传的伊索寓言 言《况义》·····	(418)
(5) 谈牛津大学所藏《况义》手抄本及其笔传者 张赓·····	(426)
3. 清代中译《伊索寓言》史话·····	(437)

4. 辛亥革命以后中译《伊索寓言》史话·····	(447)
5. “五四”运动以后外国文学在中国·····	(451)
二、外国文学和中国·····	(459)
1. 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	(459)
2. 法国文学在中国·····	(470)
3. 漫谈西葡拉美文学和中国·····	(478)
4. 罗曼·罗兰和中国·····	(488)
5. 泰戈尔和中国·····	(503)
6. 密茨凯维奇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514)
7. 我向来原是很爱裴多菲的人和诗的·····	(525)
8. 写在《回忆伏契克》中文译本的卷首·····	(532)
9. 霍加·纳斯列丁和他的笑话·····	(542)
10. 从朱哈·纳斯尔丁到阿凡提·····	(566)
三、中国作家和外国文学·····	(574)
1. 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	(574)
2. 鲁迅和《域外小说集》·····	(610)
3. 谈《阿Q正传》的世界意义·····	(618)
4. 鲁迅和史沫特莱的革命友谊·····	(634)
5. 郭沫若与外国文学·····	(643)
6. 谈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665)
编后记·····	(686)

我怎样走上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的道路

韶光易逝，流年似水！今年年初我刚度过了七十五岁的生日，用中国的说法，我已是年逾“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人了。回想到我从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喜爱外国文学，二、三十年代起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后来又专门从事研究外国文学的工作，因此我想来回顾一下我是怎样走上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的道路的。

我于1913年阴历正月10日（公历2月15日），生在江苏省东台县一个所谓“书香门第”的人家。我的家庭很早就接触到新学和民主的思想，家里有不少藏书，记得其中就有邹容的《革命军》，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还有我们童年时最喜欢看的《点石斋画报》。当1911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我们家乡时，我们家最早表示了响应。我的母亲时常说：“光复那一年，我们家门口最先挂起了白旗！”

我的父亲戈曙东，多年来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我的叔父戈公振，从1913年去上海后就终身从事新闻事业，他们对我的教育和成长都非常关心。记得童年时，叔父曾送了一盒积木给我，他在盒盖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这样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尽管这盒积木早已散失，但他写的这两句话，却长久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对我后来的生活、学习、工作和思想都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童年时，我在家乡读过四年的初级小学和三年的高等小学。

由于从小非常喜欢书，家里的人都说我是个“书呆子”。我最喜爱看的儿童读物，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记得当时从这本刊物的新年特大号上，读到了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把它遗忘！当我10岁时，叔父回过家乡一次，我请他到上海后买一套唐小圃编译的《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类编》给我。不久我就接到他寄来的6本书，他在第一本上用钢笔写着：“宝权侄览，公振寄。23.3、28”。回想起来，这已是64年以前的事了，但我把这套书一直保留到今天。我珍惜这套书，不仅因为封面上有叔父的题字；同时还因为这套书为我打开了第一扇开向外国文学的窗户，更何况我最初接触到的就是俄国文学，而且还又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作品呢！

高等小学毕业后，我就进了由南通实业家张謇在东台创办的母里师范学校。这时我们家里订阅的报刊，就有《申报》、《时报》和《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在我当时读过的书中，夏丏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原名《心》、又名《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给我的印象最深。记得当时有一个在上海读书的学生，带回来一小网篮的书，我从他那里借到了一本《新诗年选》，还有文学研究会出的新书，如叶绍钧的《隔膜》、《稻草人》，冰心的《繁星》、《超人》等。我又从一个行商书贩那里买到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这样我就最初接触到了“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

二

1928年15岁时，我考进了上海大夏大学的预科三年级。记得初到上海时，我从《文学周报》上读到赵景深写的一篇介绍小泉八云的《几个中国鬼》的文章，发现其中有关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他未能查明，我当即写了信去。想不到这封信在刊物上被发表了

出来，这可说是我写的第一篇多少与外国文学有关的文字了。

我从预科毕业后，又读了将近4年的本科，4年多的大学生活是在苦学中度过去的。这时期我如饥如渴地吸收文史方面的知识，阅读了大量的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我都非常喜爱。

在外语方面，除大学英语外，第二外国语我选修了法语，还又旁听日语。我曾从英文的《金库诗选》中选译了拜伦、雪莱和罗塞蒂的几首抒情诗，发表在1931年出版的《大夏校刊》上；从托尔斯泰的故事集中翻译了《上帝看出真情，但不立刻讲出来》和《高加索的俘虏》，发表在同学编的刊物上。当时教法语的黄仲苏先生，使我们爱上了法国文学，还知道了罗曼·罗兰和他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我认真地学习日语，是想有朝一日能到日本去留学，因为当时通过日文，可以读到其他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我也有一个时期热衷于日本文学，读了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和菊池宽等人的作品。甚至还从日文翻译过一篇关于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访问记，发表在和同学们合编的《戈壁》文艺刊物上。我也译过一些希腊神话，但未能发表。

记得那时我常步行到北四川路底内山完造开办的内山书店去买日本出版的廉价本的《改造文库》的书，因此有好几次在书店里看见过鲁迅先生。1930年3月13日还在学校的礼堂里，听鲁迅先生做过一次关于《象牙塔和蜗牛庐》的演说。三十年代初，我又读到了鲁迅翻译的《毁灭》和曹靖华翻译的《铁流》，这些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在我的叔父的鼓励下，我开始学习俄语。当从《俄语识字课本》中最初读到托尔斯泰写的《狮子和老鼠》等寓言故事，并能直接从俄文读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

当年我从大夏大学毕业后，就进了《时事新报》出版部当编辑，并开始为报刊写稿。我当时不顾自己的学识多么浅薄，曾为生活书店出版的《新生》周刊，写过一系列的《名人及名著提要》的文字。记得先后发表的，有《托马斯·摩尔的生平及其〈乌托邦〉》、《苏格拉底及〈柏拉图对话录〉》、《柏拉图及〈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及〈政治学〉》、《荷马与〈伊利亚德〉》、《荷马与〈奥德赛〉》。这些文章是用通俗有趣的笔法写的，后因我不久出国，这个计划即告中断，接着《新生》周刊也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

三

1935年3月，苏联邀请梅兰芳的剧团去苏演出，我当时不过才22岁，就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新生》周刊和《世界知识》的特约通讯员，随迎接梅剧团的专轮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我在苏联当了三年的记者，经常为国内的报刊写通信，还常到列宁图书馆和外文图书馆看书，并开始钻研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

就在1935年6月30日，我在红场举行的体育大检阅时，第一次看见高尔基和正在苏联访问的罗曼·罗兰夫妇。当年11月22日，我又应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去到托尔斯泰的故乡雅斯纳亚·波良纳参观访问。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我到工会大厦的圆柱厅去瞻仰过他的遗容，并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葬礼。当12月22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时，我又到苏联作家协会的大厅去向他的遗体告别，1937年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的百年纪念，我先后参加了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举行的各种活动，还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去访问了他的故居和墓地。我这时最初翻译了普希金的诗歌作品，为巴黎的《救国时报》编了一期纪念普希金的特辑，还为国内的《文学》月刊写了长篇通信。在苏联的三年记者生活，对我来说在学习上是个丰收的年代。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我在第二年初即经由西欧的德、法等国，从马赛乘船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3月我到了武汉，立即参加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之下的《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还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的活动。

在重庆时，我协助孔罗荪编辑的《文学月报》，并经常为《抗战文艺》和《中苏文化》等刊物写稿。我为《新华日报》翻译的爱伦堡写的报告文学作品，曾得到周恩来同志的鼓舞和赞扬。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根据周恩来同志的部署秘密去到香港，协助叶以群创办了文艺通信社，并为茅盾主编的《笔谈》半月刊译稿，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之后，方逃离香港，经九龙到了东江游击区。1942年回到重庆后，我仍在《新华日报》工作。这时我参加了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的编委会，在1944年为茅盾翻译的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小说《人民是不朽的》进行了校订工作，1945年又同茅盾等人合译了罗斯金写的《高尔基》的传记小说，同一时期，我还为新知书店编了两套丛书：一是《世界文学丛书》，其中收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考纳丘克的剧本《前线》，我对这些译本都进行了审阅，并写了序文。另一套是《史诗丛书》，其中有李霁野翻译的格鲁吉亚大诗人罗斯泰凡里的长诗《虎皮武士》，我用郭沫若为我起的笔名“苏牧”写了序文。此外还编了一本亚美尼亚的史诗《沙逊的大卫》，可惜当时未能出版。

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期间，经常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教诲与关怀，他鼓舞我要向研究外国文学的方面发展。他还亲自为我翻译的爱伦堡的报告文学作品集《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两本书题写书名。他的深情厚意，我至今念念难忘！1945年

8月28日，毛主席从延安来到重庆，我当天下午在红岩村就见到了毛主席。当周恩来同志介绍我同毛主席相见时，毛主席就对我说：“你是个俄国文学家”。这就是说，我当时在翻译和研究俄国与苏联文学方面，已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了。

四

抗战胜利后，我在1946年初回到了上海。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坏和阻挠，《新华日报》无法在上海出版，于是我就先后到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的编辑部工作。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我负责编辑《苏联文艺》；应《读书与生活》之请，写成了一本《苏联文学讲话》；此外还编辑出版了《普希金文集》、《高尔基研究年刊》（1947年和1948年各一本）、《俄罗斯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等书。假如说，在这以前我所做的工作以翻译工作为主，那么从这时起我开始了研究方面的工作，特别是侧重研究了俄国文学和中国的关系。

1949年初，我到了东北解放区。北京解放后，我到了北京，当即参加了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出席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7月我去到莫斯科，任新华社的驻苏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负责接收了国民党大使馆，任我国驻苏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和参赞，此后在莫斯科工作了5年之久。1954年回国后，任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一直到1960年。

在建国后的十多年当中，我同苏联的文学界和科研机关有过广泛的联系，访问过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深入地研究了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在俄国古典作家之外，我翻译了苏联作家高尔基、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还翻译了乌克兰的谢甫琴科、弗兰科、乌克兰英卡；哈萨克的江布尔；吉尔吉斯的托康巴耶夫；亚美尼亚的阿保维扬、伊萨克扬；白俄罗斯的库帕拉、唐克；立陶宛的文茨洛瓦等诗人和作家的作品。